

论儒藏思想的发展

□王 蕾

摘要 儒藏思想是中国古代藏书思想发展中的重要理论成果。儒藏思想吸收了佛藏与道藏思想的精华,并推进了古代公藏思想的发展。文章系统回顾了我国古代儒藏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历史,对丘濬之“藏书分三处”思想、陆世仪“藏书邹鲁”思想、曹学佺“儒藏”思想、周永年“儒藏说约”等代表性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理论成就分别进行了总结、分析和评价,并对儒藏思想影响下,清代公藏实践及儒藏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 儒藏 儒藏说 曹学佺 丘濬 陆世仪 周永年

儒藏思想源于佛藏和道藏思想,起于明代,至清代周永年创立系统的儒藏学说,刘音予以拓展,而盛极一时,上启《四库全书》编撰和四库七阁设立之思想先导,下开灵隐书藏和焦山书藏设立之思想基础,成为清代最有影响的藏书保存与利用思想。

1 儒藏思想的起源

1.1 丘濬的藏书分三处思想

1.1.1 储藏图籍之重要

明代丘濬(1421—1495)一生著述颇丰,其所著《大学衍义补》收录《论图籍之储》和《访求遗书疏》,集中地体现了他的藏书思想。

丘濬在《访求遗书疏》^[1]中言:“人臣为治之道非止一端,然皆一世一时之事。惟所谓经籍图书者,乃万年百世之事,是皆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义事功之大,建置议论之详,今世赖以知古,后世赖以知今者也。”图籍保存传承了古今帝王朝廷之政治统治经验、臣民之道德规范、山川地理之变迁、风土人情之发展,对经世治政有着极高的价值,人臣为治之道中唯一的万年百世之事。因此,他认为治国应以整治图籍为先务:“是以自古帝王任万世世道之责者,莫不以是为先务。”

1.1.2 藏于民不如藏于官

丘濬认为储藏经籍事关重大:“惟天下之物,虽奇珍异宝,既失之皆可复得。惟经籍在天地间,为生人之元气,纪往古而示来今,不可一日无者。无之,

则生人贸贸然如在冥途中行矣,其所关系岂小小哉!”

对于究竟应如何储藏经籍的问题,丘濬认为:“民庶之家,迁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广储,虽储之亦不能久。所赖石渠延阁之中,积聚之多,收藏之秘,扁钥之固,类聚者有掌故之官,阙略者有缮写之吏,损坏者有修补之工,散失者有购访之令,然后不致于泯烂散失。”由此来看,丘濬认为图籍的储藏方式关系到图籍的存亡,藏书于民不如藏于官,私人藏书,无法保证图籍储藏的长久性,且因个人好尚不一,影响到图籍收藏的完整性。而惟由国家设立储藏图籍之所,才能保证藏书的持续发展。这一观点集中地显现了明代学者对官府藏书发展的认识高度。

鉴于“前代藏书之多,有至三十七万卷者,今内阁所藏,不能什一。数十年来,在内者未闻有所考校,在外者未闻有所购求”,丘濬担心内阁藏书如不及时整治,将日渐衰落,他一方面请求朝廷诏求天下遗书,“伏望体圣祖诏求遗书之心,任万世‘斯文在兹’之责,毋使后世志艺文者,以书籍散失之咎归焉。”另一方面则建议朝廷清点内阁藏书:

乞敕内阁大学士等计议量,委学士并讲读以下官数员,督同典籍等官,拨于吏典班匠人等,逐厨开盘,将书目一一比较,或有、或无、或全、或欠、或多、或少,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及杂书、类书二类。每类若干部,每部若干卷,各类总数共若干,要见实在的数,明白开具奏报,又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衔

为记识于每卷之末,立为案卷永远存照。

1.1.3 藏书之所非止一处

对于图籍的储藏地点,丘濬指出汉宋以来,“自古藏书之所,非止一处”而明代则“罢前代省、监、馆、阁掌书之官,并其任于翰林院,设典籍二员,掌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之在文渊阁者。永乐中,遣翰林院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收贮如故,则是两京皆有储书也。”

然而,这种聚天下书于内府的作法,邱濬认为并不十分妥当,他指出:“夫天下书籍尽归内府,其人家所有者,盖亦无多。……万一有所疏失,则永绝矣,可不惜哉。”同时,鉴于两京国子监藏书形同虚设,仅是“累朝颁降之书及原贮书板,别无其它书籍”,丘濬提请朝廷清点内阁见存书籍中之副本分送两京国子监,而无副本之书则抄校数本,而后分送至两京国子监:“于内阁见存书籍内,查有副余之本,各分一本送两京国子监典籍厅收掌,仍敕南京内外守备大臣会同南京司礼监、礼部翰林院官,查盘永乐中原留南京内府书籍,有无多寡全欠,具疏奏知,量为起取存留,分派奏补。其止有一本无副余者,将本书发下国子监敕祭酒司业,行取监生抄录……”丘濬认为此法可使“一书而有数本,藏贮而有异所,永无疏失之虞矣”。

而对于朝廷的图籍建设,丘濬进一步提出抄校内府所有书籍,分颁复本至各省官府学校的建议。同时,府学、寺观、书坊、书铺所收藏之内阁书目未收之书抑或不全之书,须送交官府抄录副本,以补充内阁之书。

对于图籍的储藏地点,丘濬认为古代石室金匮的做法值得借鉴,但历代以来,“徒有金匮石室之名,而无其实。典守虽设官,藏贮虽有所,然无御灾备急之具,不幸一旦有不测之事,出于常虑之外。”他建议在文渊阁附近重新修建一所藏书专用的楼,并特别强调藏书楼的建造材料用砖石,以防水火等意外灾害侵袭。“欲乞朝廷于文渊阁近便去处别建重楼一所,不用木植,专用砖石垒砌为之,如民间所为土库者,收贮紧要文书,以防意外之虞。”

1.1.4 藏书之所分为三处

鉴于宋朝官府藏书“每卷皆有副本,分贮各所”,丘濬提出了“藏书之所分为三处”的皮藏思想,即“藏书之所分为三处,二在京师,一在南京。则是一书而

有三本,不幸一处有失,尚赖有二处之存”。同时,他还指出内府须制定和执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如书库钥匙分开掌管、不许监官擅自开柜、取书观阅并转于他人等,其意在保存典籍,并使之传之久远。具体为:

其在国子监者,如内阁例,盛以厨匱,置于典簿厅载道所中,责付典籍掌管。祭酒、监丞等官时常提调监护,然惟掌其外门之钥,及为水火盗贼之备而已。若夫厨匱锁钥,则收在内阁。每岁三伏日,如宋朝曝书给酒食费之类,先期奏请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员,偕僚属赴国子监晒晾书籍。因而查算毕事,封识扃钥,岁以为常。南监钥则付南京翰林院掌印官收掌。其曝书给酒食,亦如北监之例,皆不许监官擅自开匱,取书观阅,并转与人。内外大小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违者治以违制之罪。

1.2 陆世仪的藏书邹鲁思想

陆世仪(1611—1672)系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主张格物致知、经世实用思想,倡导实学。他在其著作《思辨录辑要》卷五^[2]中专门阐述了有关藏书永久之法的思想。

与丘濬藏书思想不同的是,陆世仪认为藏于民和藏于官均不可靠。他鉴于历史上“乱世书籍,多毁于兵火”的规律,深刻地指出“藏书之法,庶民无力,断不能藏。即学士大夫,其力不足以博及,亦不足以垂久远。能博及而垂之久远者,其惟天子乎,然天子至易代,而藏书之力亦穷矣”。

为此,陆世仪提出了一种新的藏书永久之法:“藉天子之力而不烦天子之守,其法可以传之百王而不能易,垂之千万世而无弊,则惟藏之孔氏乎。孔子自有周以来,其间历汉、唐、五代、宋、辽、金、元,世界无虑百变。然一王兴,则一王尊信;一代立,则一代表章。即盗贼强暴,未有不过之而敬,去之而不敢犯者。”在陆世仪看来,人事有变迁,世代有更迭,然儒家思想深受历朝尊崇,所以藏书于邹鲁,可免于兵燹、盗贼、朝代更迭等祸患,使书籍传之久远。陆世仪“藏书邹鲁”的具体设想为:

诚使王者于此,申藏书之法,于邹、鲁间择名山胜地,定为藏书之所,区别群书,分为数种,如经、史、子、集、志、考、图籍、艺术百家之类,类建一楼,楼置一司,择孔氏子孙之贤者为之。又择其最贤者为之长,使之任出纳收藏、晒暴补缉诸事,授之以禄。每岁则上其书之数于朝,三岁则遣行人视之,校其书之

损益完敝,而行其赏罚。如是则书有日益,无日损。虽有水火、刀兵、盗贼、变革易代之事,于藏书总无与。

陆世仪认为藏书邹鲁,对促进书籍的世代流传,有很大裨益。如他所言:

自三代以来,凡经易代,则一代之典章文物,多致散亡,不可得而考究。文献不足,自孔子之时,已有不胜其慨者矣。此宇内无人以为斯文之主故也。今既有孔氏,便当世世奉之以为斯文之主也,文献何忧不足?故愚以为王者苟能藏书于孔氏,则凡一代典章制作,与夫累朝实录,史馆一成,即送入副本,后世断无亡失,以至求之民间,采之闾巷,而有挂漏传疑之事。

除了藏书于邹、鲁之间,陆世仪还进一步提出“凡天下郡邑名山,皆当仿此为藏书之法。相择胜地,广置书籍,聘礼先代圣贤之后,优其廩饩,使典其事,相戒虽有斗争讼狱兵火盗贼之害,不得入其处,久之则天下自然习以成风,诗书日盛,道义日尊矣。”在他看来,藏书邹鲁的方法具有推广性,可在天下郡邑名山建立藏书之所,广泛效仿此法,从而全面推进社会藏书发展。

“藏书邹鲁”的思想虽然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但陆世仪仅从儒家思想的累世地位而作出的推断,在实践上颇有些脱离实际。但陆氏广置副本,藏之天下郡邑名山的思想,对其后“儒藏说”思想的发展不无启示。

1.3 曹学佺的儒藏藏书思想

曹学佺(1574—1646)是晚明颇具盛名的学者和藏书家,他率先倡议建立儒藏,是“儒藏”思想最早的提出者。

曹学佺一生在学术和实践上均具有外佛内儒的特点,清《湛然居士文集·后续二》曾评价他道:“观居士之所为,迹释而心儒,名释而实儒,言释而行儒,术释而治儒。”正因为如此,曹学佺借佛藏道藏之鉴,首倡“儒藏”之义。

曹学佺认为“天下之物公则久,私则不能久”^[3]。他在《建阳斗峰寺清藏碑文》中云:

释道有藏,吾儒独无藏,释藏南北二京皆有版,道藏惟北京有版,以此见释教之传布者广,而奉释者为教之念公也。《隋唐经籍志》以经史子集分为四库,宋《崇文总目》亦然,《文献通考》,郑夹祭《十二略》皆因之循名,责实未尝不与二藏相颉颃。惟是藏

书家馆阁自馆阁,私塾自私塾,未尝流通,故其积之不久,或遇水火盗贼之灾,易姓播迁之事,率无有存者^[3]。

曹学佺认为释道有藏,而儒独无藏,且官私藏书各自为政,未尝流通,所以一遇变故或者灾害,即遭损毁。有鉴于此,他在《五经困学自序》中明确提出其欲修儒藏之宏志:“予盖欲修《儒藏》焉,以经先之也。撷四库之精华,与二氏为鼎峙,予之志愿毕矣。”^[4]。曹氏一生浸润典籍,深谙释、道典籍之所以历数百乃至千年而保藏完好,流传久远之原因,因此主张仿效释道二藏,建立“儒藏”,既可与释藏道藏并立,亦可促进儒学经典的传播。

曹学佺不仅首倡“儒藏”之义,而且致力于“儒藏”的编撰。《明史 曹学佺传》载:“尝谓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欲修儒藏与鼎立。采撷四库书,因类分辑。十有余年,功未及竣,两京继覆。”^[5]遗憾的是,曹学佺历时十年,终因明亡变乱,壮志未酬,但是他首倡“儒藏”之义影响十分深远。

周永年评价道:“曹能始儒藏之义,自古藏书家所未及,当以天下万世有心目者之公愿。”^[6]当代学者来新夏评价道:“儒藏之事虽未成,但立儒藏的思想却对保存典籍,便利学人有益,对藏书建设与藏书史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贡献,而其影响更及于后世。”^[7]

2 儒藏思想的发展:周永年的儒藏说

清代周永年(1730—1791)一生藏书宏富,官至翰林院编修,参与《四库全书》纂修,所著《儒藏说》^[8]集中体现了他的藏书思想,影响深远。他在《儒藏说》及所附《儒藏条约三则》、《与李南涧札》、《覆俞潜山》、《与孔从谷》及《覆韩青田师》等文中,系统阐释了其“儒藏”思想的目的、内容、作用与意义,详细规定了儒藏建设、典藏、管理、经费及流通利用等具体设想。同时,周永年还建借书园,躬身实践其儒藏思想,“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抄,以广流传”。周永年出身贫寒,深知寒贫文士读书之难,希望以自己的能力可为无书可读的贫寒之士提供资源,真正实现书籍价值的流传,这也是他《儒藏说》的重要思想之一。可以说,周永年是清代藏书流通与开放思想的重要代表,他的藏书思想对清代官私藏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影响深远。

2.1 儒藏说的核心思想

周永年的儒藏说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相关思想,其立论的基础和思想的核心集中体现在“公”与“共”两个方面,并且贯穿于其儒藏说思想的始终。

2.1.1 藏书公之能久存

“公”是儒藏说的一个核心思想,其要在藏书公之能久存。

周永年通过对历代藏书的考察发现:“自汉以来,购书藏书,其说綦详。官私之藏,著录亦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於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於万世也。”究其原因,“盖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据,公之而不能久存者”。显然,周永年的这种思想,继承了明代曹学佺的“天下之物公则久,私则不能久”^[3]的思想。

然而,周永年并没有像曹学佺那样仅仅停留此立论上,而是进一步对此立论进行了深入的论证。

周永年认为:“竹帛变为摹印,书之流传较易,然考历代艺文录存而书亡者,多矣”,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书不值得流传,而在于“藏之者无法”。

鉴于“释者之书,正伪参半,美恶错出,惟藏之有法,故历久不替”,周永年认为明代曹学佺欲仿佛藏道藏之法而设立儒藏,可以避免“藏之一地,不能藏於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於万世”二者之患,即为藏之有法。

显然,周永年的儒藏说直接继承了曹学佺的儒藏思想。而同时,周永年认为丘濬和陆世仪的藏书思想亦属儒藏思想。他言:“丘琼山欲分三处以藏书,陆桴亭欲藏书于邹鲁,而以孔氏之子孙领其事,又必多置副本,藏于他处,其意皆欲为儒藏而未尽其说。”在继承丘濬、陆世仪和曹学佺的儒藏思想基础上,周永年提出:儒藏“惟分藏於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刹,又设为经久之法,即偶有残缺,而彼此可以互补,斯为上策”。也就是说,藏于天下,公之天下,才是典籍藏于万世的上策。

设立儒藏并非易事,但周永年认为并没有愚公移山那么艰难,只要立志坚固即可成其事。对于“聚儒者之书”设立儒藏,是否是抄袭佛藏道藏之名的诘问,周永年认为,“守藏之吏,见于周官”,“二氏以藏名其书,乃窃取儒者之义,今日举之,岂曰袭而用之哉!”对于儒藏卷帙浩繁,就个人来说并非全部有用,周永年认为只要“条分眉列”,即可“任人所求”,“故儒藏之成,可以变天下无用之学为有用之学”。凡此

种种,周永年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排除了各种有关儒藏的疑问和困难。

2.1.2 天下万世共读之

“共”是儒藏说的另一个核心思想,其要在天下万世共读之,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古代藏书“公”“共”思想。

周永年认为如果能够设立儒藏,“天下都会所聚簪纓之族,后生资稟苟少出于众,闻见必不甚固陋,以犹有流传储藏之书故也。至于穷乡僻壤,寒门寒士,往往负超群之资,抱好古之心,欲购书而无从,故虽矻矻穷年而限于闻见,所学迄不能自广。果使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而异敏之士或裹粮而至,或假馆以读,数年之内,可以略窥古人之大全,其才之成也,岂不事半功倍哉? 欧阳公曰:凡物非好之而有力则不能聚。儒藏既立,可以释此憾矣。”

正因为如此,鉴于明曹学佺虽然有儒藏之倡议,终未成就,周永年乃倡议:“愿与海内同人共肩斯任,务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

2.2 儒藏说的基本思想

2.2.1 儒藏结聚思想

周永年认识到儒藏的建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所需人力、财力、物力等亦非一人所能为。因此,他首先提出了一个“变通之法”,具体为:

其一、建义学设义田,以待四方能读之人。周永年在《儒藏条约三则》^[9]中言:“经、史、子、集,凡有板之书,在今日颇为易得。若於数百里内,择胜地名区,建义学,设义田,凡有志斯事者,或出其家藏,或捐金购买於中,以待四方能读之人,终胜於一家之藏。”这种变通之法试图通过在各地建义学、设义田,发动天下所有的有志者捐书、捐资,共同建立儒藏,设立公共藏书。其要在于变通设立儒藏之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困难,这与古代书院及其藏书建设的模式颇为类似,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其二、编撰儒藏书目,相互传抄,互补未备。周永年认为儒藏之立有赖于众人共为之,“即如立书目,名曰:《儒藏未定目录》。由近及远,书目可以互相传抄,因以知古人之书,或存或佚。凡有藏之处,置活板一副,将秘本不甚流传者,彼此可以互补其所未备。”这种编撰儒藏书目,相互传抄,互补未备的思想,十分类似现代的联合目录、馆际互借和共建共享思想,难能可贵。

周永年在思考上述儒藏结聚的方法时考虑到了现实的条件,他认为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如此则数十年之间,奇闻秘籍,渐次流通。始也积少而为多,继由半以窥全。力不论其厚簿,书不拘于多寡。人人可办,处处可行。一县之长官可劝一县共为之,一方之巨族可率一方共为之”。他在《与李南涧札》中亦言:“儒藏果成,则有大力而好事者,欲刻必先刻此一藏,欲藏必先藏此一藏。古人佳书幸存于今者,从此日使永不淫没。”^[6]

2.2.2 儒藏保藏思想

儒藏既成,若藏于天下,藏于万世,必须藏之有法。周永年认为保藏儒藏之法有三:

其一、收藏:应“分藏于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刹”。这种分散保藏副本的方法,可以避免因为各种书厄而导致儒藏的损毁。

其二、选址:“藏书宜择山林闲旷之地,或附近寺观有佛藏、道藏,亦可互相卫护。”其要在防火防盗,继承了前人的藏书建筑保护思想。

其三、建筑:宜采用石室模式,“吾乡神通寺有藏经石室,乃明万历中释某所为。其室去寺半里许,以远火厄,且累石砌成,上为砖券,今将二百年,犹尚牢固,是可以为法也。”

2.2.3 儒藏管理思想

对儒藏的管理方法,周永年提出了如下观点:

其一、在儒藏的內部业务管理上,他认为:“书籍收藏之宜,及每岁田租所入,须共推一方老成三五人,经理其事。”这种共同推举三五人集体管理书籍收藏和田租收入的方法,颇类似于现代的民主管理。

其二、在读者管理上,周永年提出:“凡四方来读书者,如自能供给,即可不取诸此,寒士则供其食饮。须略立规条,如丛林故事。极寒者并量给束修,免其内顾之忧。有余仍贮存之,以为置书增田之费。”这种读者管理思想集中体现了“义”(公益)。对于“自能供给”的读者,免费服务;对于贫寒的读者,不仅免费服务,而且还免费提供饮食;对于极其贫寒的读者,则酌情给予生活费用。所有这些读者服务“须略立规条”,以便在使用“每岁田租所入”资助读者时有所依据。这种免费服务的儒藏思想,比西方19世纪中期产生的“公共图书馆”要早一百多年,比今天的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思想还要更加上一层楼,是对弱势群体共读儒藏(或者平等利用儒藏)的一种政策保障和救济。

其三、在读者服务上,周永年提出:“儒藏既立,可取自汉以来先儒所传读书之法编为一集,列于群书之前。经义治事,各示以不可紊之序,不可缺之功。凡欲读藏者,既以此编为师,斯涉海有航,无远弗届。而书籍灿陈,且如淮阴之用兵,多多益善矣,又何患其泛滥而无归哉?”由此可见,周永年对于阅读指导工作的重视,故有学者认为周永年是中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的最早提出者,不无道理。

3 儒藏说的影响

3.1 广儒藏说

周永年在《儒藏说》中呼吁:“愿与海内同人共肩斯任,务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儒藏说随后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其友人刘音撰《广儒藏说》^[10],倡议积极响应和支持《儒藏说》。

刘音撰《广儒藏说》意在推广宣传周永年的儒藏说。他指出历代著述典籍丰富,前代之书仰赖后代藏传,“是书愈多愈易散,而藏之者愈难矣”。有鉴于此,刘音认为如欲实现古今典籍的长远保存而不致散佚,莫过于建立儒藏。“今欲其聚而不散,令上下千古之书有所依归,则莫善于《儒藏》。”他对周永年的《儒藏说》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认为周永年的儒藏倡议“诚宇宙间一公事也”,所以撰《广儒藏说》“广其意而为是说”,呼吁:“愿天下潜心于吾道者共相赞勸,毋生疑阻焉。”从中可见周永年提出的“儒藏”思想,在当时所引起的反响。

3.2 四库七阁

周永年儒藏说的最重大贡献和影响是为《四库全书》纂修和四库七阁设立奠定了理论基础。郭伯恭指出:“《四库全书》编纂之动机,其政治作用固大,但就表面而言,当时所受之影响,尚有两端:其一,汉学之勃兴……其二,儒藏说之提倡——儒藏之说,……乾隆间,历城周永年见收藏家易散,乃援说倡《儒藏说》,提倡集合儒家与释藏、道藏鼎足而三……当时士大夫颇有受其影响者,于是儒藏之说,由个人而及国家,由理想而成事实,故《四库全书》之成就,士林以倡导之,归诸永年。”^[11]任松如分析编纂《四库全书》有三个重要的原因。其中之一即为周永年提倡集合儒书,与释藏、道藏鼎足而三,倡《儒藏说》^[12]。可见,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为《四库全书》的纂修奠定了一定的社会舆论和思想基础。《四库全

书》涵盖了清以前中国历代主要文献典籍,客观上保存和传播了古今珍贵典籍,与周永年“儒藏”倡议动机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四库全书》成书后,在江南设立三阁,向社会开放^[13],吸引了许多名流大儒、士绅学者登阁阅览或借抄,对社会学风影响颇广^[14]。

《四库全书》的编撰和四库七阁的设立将周永年的儒藏说思想部分地变成了现实。直到今天,有关《四库全书》的各种续编出版活动,乃至多个儒藏的编撰计划,仍然深受周永年儒藏说思想的深刻影响。

3.3 灵隐书藏、焦山书藏

嘉庆十四年(1809),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鉴于“好学之士,半属寒酸,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于浙江杭州灵隐寺建立书藏。何名“书藏”?藏书之所名藏,古已有之。且自隋唐以来,释、道之典,陆续有藏,独儒学无藏。阮元之意在承明曹学佺儒藏之论。灵隐书藏的建立,初意源于清代著名学者翁方纲欲置《复初斋集》于灵隐寺,其后阮元与顾星桥、陈桂堂、石琢堂、郭频伽、何梦华等人动议此事,认为藏书于名山僻远之地,可流传久远,遂建此书藏。故灵隐书藏建立初衷一方面希为好学之士提供读书之资,另一方面系受明以来儒藏说之影响,意在促进书籍保存与流传。1813年,阮元继灵隐书藏之后又于镇江焦山建立焦山书藏。此书藏设立模式、管理与皮藏方式等与灵隐书藏一应相似。焦山书藏积极倡导社会文人学者将他们的著述、藏书、刻书自愿捐藏,这种藏书发展模式具有开放性,也决定了书藏藏书利用的开放性。仿灵隐书藏,焦山书藏也建立有规范的书藏条例,促进藏书管理与利用。

阮元的书藏思想强调书籍由社会共建,并且向社会开放,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此外,阮元还设立书藏条例,系统规定了书藏的具体管理与利用方式,涵盖了书籍入藏登记、分类、排架、印章、挂签、经费、人员、阅览与利用等规定,如“书或写书脑,或挂绵纸籤,以便查检”,“书既入藏,不许复出,纵有翻阅之人,但在阁中,毋出阁门。寺僧有鬻借霉乱者,外人有携窃涂损者,皆究之”等^[15]。足见其管理的规范程度。书藏专设管理员两名,书籍建设采取由社会人士自愿送捐方式,或酬之以钱,或接受捐赠。书籍入藏之后,准许在阁中阅览,但不提供外借。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已颇具开放意识。

阮元所设灵隐、焦山二藏在清代藏书事业及藏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说,他是乾嘉时期藏书开放派思想的重要代表,书藏的建立已突破了传统私人藏书楼的性质,又与《四库全书》江南三阁的官府藏书,以及书院藏书、寺院藏书性质明显不同,其建立已经具有很高的社会公益性与开放性。阮元的这种开放思想与实践,一方面具有儒藏思想的深刻印记,一方面在实践成效上,对当时社会藏书事业的发展,以及清代藏书家的藏书思想必然产生了深刻的启发与影响。清代乾嘉之后,藏书开放思想不断深化与普及,开放实践日益丰富,此二藏正是良好的例证。有研究者评价其“虽仍偏重于保存,但已略具近代图书馆的性质,为学人阅读提供了方便,对于推动当时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6]。

参考文献

- 1 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 第一册:卷七六 邱元莊公奏疏 访求遗书疏.北京:中华书局,1962.6:649-653
- 2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 一:卷五 格致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63-64
- 3 曹学佺.曹大理诗文集.明刊本
- 4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五十 曹氏学佺五经困学.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120
- 5 张廷玉等撰.明史 第二四册:卷二百八十八 曹学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7401
- 6 周永年.与李南涧札.见: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50
- 7 王国强.“儒藏说”评析.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5):59-62,45,91
- 8 周永年.儒藏说.见: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47-49
- 9 周永年.儒藏条约三则.见: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49
- 10 刘音撰,李冬梅校点.广儒藏说.见: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52
- 11 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长沙:岳麓书社,2010:2
- 12 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卷上.上海:上海启智书局,1933:3
-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 下:一〇一六 谕内閣将来江浙文汇等三閣分貯全书许读书者领出传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768
- 14 刘清.中国最早的圣谕公共图书馆——江南三阁《四库全书》的续藏与管理.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08(3):141-143
- 15 阮元.杭州灵隐书藏记 附:书藏条例.见: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82
- 16 陈东辉.杭州灵隐书藏述要.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2):53-56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图书馆,广州,510275

收稿日期:2012年4月6日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Collection Theory

Wang Lei

Abstract: Confucian collection is a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ncient thoughts in book preservation. It absorbs the essences of Buddhism collection and Taoism collection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s in ancient public collec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and makes systematical summary,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n the core and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representative thoughts such as Qiu Jun's idea of preserving books in three places, Lu Shiyi's discussion on preserving books, Cao Xuequan's understanding of Confucianism, Zhou Yongnian's idea of preserving books to circulate, and etc. respectively. It also summarizes the public preserving practices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influences 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Keywords: Confucian Collection; Theory of Confucian Collection; Cao Xuequan; Qiu Jun; Zhou Yongnian